



中國人民大學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论文题目：数商兴农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  
——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

学 院：经济学院

专 业：政治经济学

学 号：2021000354

姓 名：吴 迪

2022.12.31

# 数商兴农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

## ——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

吴迪

**摘要：**“数商兴农”打通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服务、现代物流体系与电商平台全链路、全过程，以数据信息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为核心，带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向农村流动和整合配置，改变农民分配状况，为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条件。本文从要素流动视角切入分析，论述数商兴农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传导机制，具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数商兴农背景下，信息数据流动扩大要素流动规模，引导从农业生产到销售过程中城乡要素的密集流动；第二，农村要素可调动性增强，激发农村新的要素平衡需求，促使农业农村组织分工转变和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第三，数商得以向农村产业和农民赋能，弥补不平等的占有和分配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本文建议消除阻碍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障碍，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据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引导要素在农村不同产业部门和组织主体之间均衡分配，并为农村产业和农民赋能，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关键词：**数商兴农；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要素流动

### 一、引言

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一直面临着城乡收入分配难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始终处于重要地位。从统计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在 2009 年达到最高点 3.33，2009 年以后逐渐减少，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缩小，但仍维持在 2.5 左右的高位上，高于国际平均水平（龚六堂，2020；Yuan et al., 2020），而在考虑社会保障和实物补贴等非货币收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更大（李实，2003）。另外，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2013-2021 年，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速比城镇居民快 1.7%<sup>①</sup>，城乡收入差距有所改善，但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依然较大，与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

很大程度上，城乡要素流动状况是产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原因，要素作为生产条件的主要部分，其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联系密切（蔡昉和杨涛，2000；郭庆旺和吕冰洋，2012）。一方面，中国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导致要素在城市和乡村分布不均衡，形成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势能差，进一步促使各要素向城市流动，在城市产生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而农村要素流失严重，制度性壁垒也制约着要素向农村的流动，城乡鸿沟愈来愈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素具有逐利性，更多地流向效率较高的城市地区（Long et al., 2016；王向阳等，2020；赵儒煜和邵昱晔，2011）。所以，农村要素市场不发达，限制了要素优化配置和生产力发展，个人作为要素的拥有者和产品增值收益的获取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便会扩大。需要提升城乡要素流动性、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城乡收

---

<sup>①</sup> 国家统计局：《10 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新华社 2022 年 10 月 12 日。

入分配格局,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发展,数字经济逐步下沉到农村市场,电子商务扩张速度尤其突出,成为数字经济中规模最大、表现最活跃、发展势头最好的新业态新动能,吸引了更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进入三农领域,畅通要素流动、提高供需信息匹配、有效对接农村产品与大市场(Murdoch, 2000; 陈一明, 2021; 张旺和白永秀, 2022; 田野等, 2022),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推进电子商务进乡村。“数商”顾名思义即“数字商务”,与传统电子商务所不同的是,数字商务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赋能农村产业,实现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打通“产、供、销、服”全产业链,促进产销对接,如阿里巴巴集团建设数字农业基地、设立智能产地仓和菜鸟乡村共同配送中心,与消费端近场电商相结合,更高效连接农民与消费者(欧阳日辉, 2022; 彭超等, 2022)。研究数商这一新发展趋势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与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探索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也为解释并着力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更加多样的视角。

因此,本文将数商定义为通过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服务、现代物流体系与电商平台,有效连接起农村的生产供应端与城市的消费需求端的商务模式,从要素流动角度切入分析,论述数商兴农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传导机制。

## 二、文献综述

### (一)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要素流动

收入分配问题历来是政治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重要领域,不同的理论观点都涉及了要素流动在收入分配演变过程中的作用逻辑。

马克思的分配理论认为,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包括客观生产条件的分配和主观生产条件即生产的劳动力条件的分配,不仅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而且在不同生产部门和领域分配,这两方面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和影响产品或收入分配的结果。在市场机制过程中,生产商品需要生产条件的交换,也就是生产要素的流动,各种要素被赋予一定的价格,要素所有者以要素价格的形式参与分配,不同要素拥有者以及不同生产部门所需要素的提供者之间就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因权利配置不公、流动性制度障碍、国民待遇不统一等因素易与客观生产要素市场化分离甚至经济性分离,无法获取剩余或失去获取收入的机会(陈享光, 2013),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系统研究城乡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存在二元分割,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城市工业部门只需支付高于农业边际回报率工资水平就可以吸引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加速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集聚,城市生产效率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直到农村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工业部门不能以不变工资雇佣剩余劳动力,生产要素回流农村,两部门边际生产率相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更加公平有效。拉尼斯和费景汉、托达罗等相继发展完善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从动态视角考虑农业发展、工农业均衡增长、城市失业率、劳动力迁移成本等,越来越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发

展的主体地位,而非仅将其作为城市化、工业化的工具。库兹涅茨提出了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假说,并认为收入差距变化是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条件造成的,应当对这些历史条件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王小鲁和樊纲,2005)。威廉姆斯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区域经济研究,认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必然将资源配置在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区域差距增强,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国家将资源向落后地区配置以实现平衡增长,区域差异缩小。由此可以认为,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配置会影响城乡差距,但具体的变动情况还需结合发展背景详细讨论。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为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要素流动提供了新的思路。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较多生产要素集聚的地区将成为增长极,实现优先发展并对周边区域产生扩散和辐射效应。城市增长极在一定时期内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建立合适的增长极可能会促使要素向农村流动,带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赫希曼提出了区域非均衡增长过程中的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涓滴效应指要素由于在增长极区域的边际产出递减而向欠发达地区回流,促进区域间发展趋于收敛,极化效应指要素由于趋利性集中流向部分区域和工业并产生循环累积,造成区域既有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与上述相似,都强调了要素流动与配置在二元结构演化中的作用。比较优势理论从要素禀赋角度解释了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遵循比较优势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实现快速发展、收入收敛的较好办法。斯蒂格里茨则认为传统要素是流动的,在地区间流转会降低比较优势的作用,最重要的要素是不易流动的学习能力,政策制定需要能够利用个体在知识和学习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并不断提高这些能力。这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的解释力,若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应当提高农民的知识学习能力和信息获取水平,数字化产品就是一个较好的传播与学习工具。

对现实发展的研究也证明了要素流动在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和城乡分割政策,如户籍制度、财税金融体制、土地制度、产权制度等,抑制要素在市场机制下的自由流动,导致要素市场扭曲与要素错配,形成农村要素外流与城乡边际收益扩大的恶性循环,强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陆铭和陈钊,2004;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Chen et al.,2020)。学者们基本认同,若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改善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优化城乡要素配置,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蔡昉,2003;Sicular et al.,2007;王颂吉和白永秀,2013)。从单个要素角度来看,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是在已有研究中讨论较多的要素。孙宁华等(2009)发现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和制度使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就业的报酬有显著不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出发,应该尽可能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因素,实现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高帆和李童(2016)通过估算发现城市资本边际收益率高于农村,农村资本持续流向城市,城乡资本流动不存在“卢卡斯之谜”,要改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提升农村资本边际收益率,依据要素市场机制实现城乡资本的流动与协调配置。钱忠好和牟燕(2013)发现土地市场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政府需要加速土地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除此之外,部分文献还分析了技术要素、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等的作用(刘欢,2020;刘晓光等,2015;沈坤荣和张璟,2007),认为非均衡要素配置会加

剧农民负担，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 （二）数商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

互联网技术普及与应用以来，经济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程度迅速提高，成为增长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逐渐进入国内外学者的视野。

在数字信息发展与地理经济的研究方面，Castells（2010）的“流空间”理论较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把空间分为传统地理空间和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流空间。流空间是围绕信息流组织起来的，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节点功能、主导管理阶层，连接了不同地理空间的要素和事物，存在时空压缩效应，信息流易于从生产者渗透到整个领域中的相关者，引导各种要素流动与配置、改变节点特点、拓展节点功能，致使空间节点和其中的个体产生分配差异。沈丽珍等（2010）综合以往研究，把网络流空间定义为围绕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要素流动建立起来的空间，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流线和快速交通流线为支撑，新的工业空间围绕信息流组成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从而不同空间存在差异化收入分配。近年来，流空间理论被用来解释电子商务的影响，认为淘宝村是流空间的重要节点，增强了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和农村要素的调动性，产生协同、替代、衍生、增强效应，引发全新的农业农村要素配置和功能结构，产业要素配置契合、网络与地理耦合、城乡经济社会融合，最终服务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效益提升（陈宏伟和张京祥，2018；陈国军和王国恩，2022；Zhang et al, 2022），农民收入水平整体向上流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数字信息技术还具有网络外部性，一方面能够促进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一体化，降低搜索成本和交易成本、加强技术创新和扩散，带来收益递增和规模经济，进而对外围区域的经济收入产生正向溢出效应（Arthur, 1996；Roller & Waverman, 2001）。另一方面，这种网络外部性通过去中心化降低了产业地理集聚的重要性，通过对供给链的整体分散与环节集聚、对市场规模的实体分散与虚拟集聚、对市场关联成本的地理距离衰减效应，改变了产业空间布局（Roller & Waverman, 2001；吴婵丹，2015），数字信息技术相关行业不再集聚到城市空间，而逐渐向农村和偏远地区分布，农村产业结构多元化，城乡差距缩小。这部分的研究多从 ICT 着手分析，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引力模型或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 ICT 对增长和发展的影响。如蔡跃洲和张钧南（2015）细致分解 1977-2012 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发现 ICT 对增长存在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替代效应在 1990 年以后呈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2010-2012 年间更是接近同期 TFP 的贡献率。郭家堂和骆品亮（2016）除了测算互联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还认为互联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以网民人口比例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分析，得出网络效应的临界值为 41.43%。Kauffman & Kumar（2008）使用联立方程模型测度了 ICT 对贸易、农业生产、R&D 和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发现 ICT 对这四个领域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这四个领域和 ICT 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从动态视角说明了 ICT 的网络效应。引力模型多用于国际贸易研究，如范鑫（2020）发现进口国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出口贸易效率，也会增加中国出口贸易的不确定性，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给国际贸易同时带来机遇和挑战。

更具体的，已有文献对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与城乡收入的分析为本文的数商兴农研究提供了启发，大致分为两种相反的观点。部分研究从交易成本角度出发，认为数字经济或电子商务通过降低农民获取市场信息的成本与流通成本等在内的交易成本，帮助小农户克服市场准入障碍，拓展农村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强就

业和创业活力（王奇等，2021；Gao et al, 2018），是提升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模式。陈享光等（2021）从要素流动和财政支出结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政府对农村电商的政策性扶持有助于吸引资本流入和人才回流，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部分研究则根据“平台效应”、“数字鸿沟”等概念，认为数字平台会产生壁垒，加剧利益向少部分人集中，基础设施、教育水平、技术认知和使用能力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更会因此扩大与其他地区的“数字鸿沟”（Nakayama, 2009；曾亿武等，2018）。如张磊和韩雷（2017）发现由于城乡发展条件和环境不同，电商经济并未实现城乡居民收益共享，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李宏兵等（2021）指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会使产业高级化的短期收益由城镇居民获得，因此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 U 形。Tang & Zhu（2020）对浙江省泽国镇进行案例分析，基于非正规经济理论，认为小企业涌入农村不仅会提高用地用工成本，还破坏了龙头企业的运作，不利于农村电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明显。

### 三、要素流动视角下数商兴农影响

####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传导机制

根据对以往研究的梳理，本文把数商定义为通过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服务、现代物流体系与电商平台，有效连接起农村的生产供应端与城市的消费需求端的商务模式，构建如图 1 所示的传导机制框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数商兴农背景下，信息数据是助推农村发展的核心要素，利用时空压缩效应，扩大要素流动规模，通过价格机制、利益机制、供求机制引导农业生产、运输和销售过程中城乡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的密集流动；其次，农村要素可调动性增强，流动要素与农村当地要素整合，激发农村新的要素平衡需求，促使农业农村组织分工转变和生产要素重新配置，驱动乡村产业兴旺；最后，数商得以向农村产业和农民赋能，增强农民的信息获取能力与从业技能，弥补不平等的占有和分配结构，掀起“草根创业”热潮（范如国，2021；Salemink et al, 2017），并创造出多样化的产业与工作，农民完成职业流动、阶层流动和收入流动（Carmen et al, 2016；Brandth & Haugen, 2011），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体传导机制过程如下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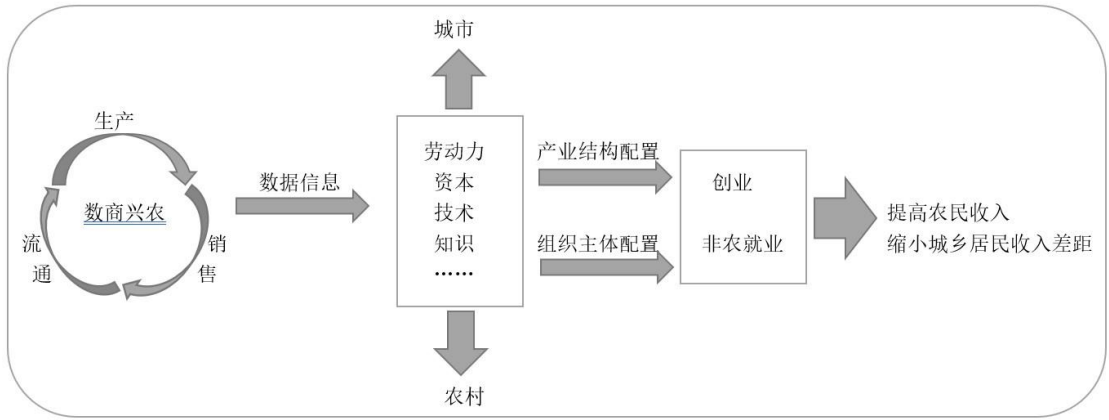


图 1 传导机制

第一，数商兴农背景下数据信息成为核心要素，扩大要素流动空间，引导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要素向农村流动。首先，数商兴农是把数据信息作为农村生产

要素的一种发展模式，打破了地理空间界限，开辟网络空间，扩大要素流动的容量，为各要素流动提供物质条件。其次，农业准备生产时，农民可以提前获得城市需求端的市场数据、线上需求大数据和消费大数据，信息数据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指导不同农产品、农业区域间的科学布局与合理种植、配送、加工等，同时在政府政策扶持下，农业生产对要素的需求增多，要素在农村具有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高的边际收益，要素回报率上升，形成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的内在动力，城市成为要素的供给方，在这种价格机制、利益机制和供求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带动劳动力和资本流至农村，部分人才还带来了物联网、订单农业、新零售等新技术、新概念。农业生产时，数字农业生产端信息传至线上物联网络，在农业生产空间内流动并外流至城市决策端，农产品可以被溯源至种植生产阶段，便于农民及时调整生产决策和管理者调整与之匹配的要素流动，以减少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风险、提高生产效用。产品运输和销售时，村组织方或中介组织方根据城市需求信息带领农民实施收获、储藏、运输和销售，这一过程中现代物流体系的建设，如冷链仓储、公路和铁路冷链物流运输设施、智能快递配送，再次推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要素向农村流动，为农产品顺利上行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条件。

第二，要素在农村产业间和不同组织主体间整合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一方面，数据信息要素的加入扩大了农村要素的规模，提高了农村要素的调动性，信息普及也有利于增加对农业相关产业要素需求的认知，并依照全链路产业特征和长远发展目标进行要素匹配，如从农业生产、加工、运输到零售，特色品牌、产权认证、绿色生态等无形效益目标，以期实现共同体的最大利益，而非仅通过单独的、一个或一次的要素流动实现阶段性最大利益。总之，智能计算代替人力配置要素，要素配置数字化，增加了要素配置的广度和精度，降低配置成本，提高配置效率（陈国军和王国恩，2022）。数据信息还通过与农村自然资源、土地要素和城乡劳动力、资本、知识等流动要素的调配组合，嵌入农村产业空间，对生产和需求的结构以及组织形态进行创新性构建，创造出多样化的新需求、新业态，如产品加工、物流运输、网点服务，使得要素被分配至不同环节，在各种产业中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数商兴农需要通过村内集体组织或中介组织代表或组织农民与平台及销售企业协商，这类组织不同于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第三方中介商，他们的核心是为农民服务，为农村发展服务，在与村外市场的联通过程中尽可能提高产业链低端农业生产优势，增强农民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保证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性地位，保障农民合理的生产要素分配和收益分配，推动要素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有效配置。

第三，农村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创业和非农就业农民比例，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创业方面，数商兴农背景下要素的整合配置使农村先前无法进入市场的“僵化资本”如土地、房屋、零碎时间、闲置劳动力等得以进入市场，向资本转化，同时为个体赋能，促进知识扩散，增加个体资产数量并提高资产的转化率（邱泽奇等，2016）。也就是说，数商兴农将农民积累的各式各样的资源转化为发展机会，传统农民身份发生流动，一是逐渐向主人身份转变，二是身份意义具有多重性，表现为自主学习空间扩展、创业增长、经营范围扩大等多个部分（Ploeg, 2010; Brandth & Haugen, 2011），为农民创造了新的和额外的收入。数商相关产业也给市场需求带来非常细微的差异和超大规模，双重乘数效应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产品垄断的可能，催生了销售各种产品的网络零售商（邱泽奇等，2016），电商产品的同质化也比较严重，可替代性强，消费者希望有更



多的选择,不仅为众多潜在的创业者提供了契机,还提高了自营的稳定性和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农民收入得以长期稳定增长,缩小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

在就业方面,数商兴农背景下要素的整合配置为产业赋能,不仅在农村衍生出加工、零售、物流等新产业,还对传统行业形成叠加效应、渗透效应和扩散效应,重建农村产业结构,创造新的生产发展形式,提高物质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水平。农民与这些非农经济变革过程联系起来,嵌入产业链的不同工作任务中,与现代产业和大市场有机衔接,劳动力市场被重构,农民就业比例提高且呈非农化趋势,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模式、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不少农民可以同时获得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容易导致社会经济结构性扭曲和不平衡增长,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相悖。近年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影响日益延伸到农业农村领域,因其包容性、高效率和创新特性,为农民提供了发展机会。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以数字农业、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为依托,以信息数据为基础,以各要素流动为动力,是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研究了数商兴农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梳理了关于城乡二元经济、要素流动、数字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文献,并据此说明数商兴农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数商兴农背景下数据信息要素处于关键地位,带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在农业数字化生产、加工、信息化流通、销售全链路向农村流动以及城乡双向流动,扩大流动规模,各个链条联通对接;第二,农村要素的可调动性增强,流动要素和农村已有要素整合,在不同产业和组织主体间合理配置,数字化配置有助于降低配置成本、提高配置效率,中介组织也以推动农业降本增效提质和助农增收为目标;第三,要素的有效配置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多元化,同时知识信息普及,农民个体得到赋能,提高创业农民数量和非农就业比例,农民收入模式多样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为更好发挥“数商兴农”工程的作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需要逐步消除阻碍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障碍,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带动生产要素向农村的规模化流动。与此同时,加强数字化服务的研发创新,提升数据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充分发挥数据这一新型要素对农业从准备生产到销售各个阶段的赋能,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和工作内容多样化;引导要素在农村不同产业部门和组织主体之间均衡分配,加大对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培训,培养数商人才,保障农民的机会均等和权利平等,从而确保农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 参考文献

- [1]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0(04):11-22+204.
- [2]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3(05):16-25+205.
- [3]蔡跃洲,张钧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J].经济研究,2015,50(12):100-114.
- [4]曾亿武,郭红东,金松青.电子商务有益于农民增收吗?——来自江苏沭阳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8(02):49-64.



- [5]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2013(04):81-102+206.
- [6]陈国军,王国恩.“盒马村”的“流空间”透视:数字农业经济驱动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重构[J/OL].农业经济问题:1-20[2022-12-28].
- [7]陈宏伟,张京祥.解读淘宝村:流空间驱动下的乡村发展转型[J].城市规划,2018,42(09):97-105.
- [8]陈享光,汤龙,唐跃桓.农村电商政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要素流动和支出结构的视角[J/OL].农业技术经济:1-15[2022-12-28].
- [9]陈享光.论建立公平与效率协调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01):20-26.
- [10]陈一明.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创新[J].农业经济问题,2021(12):81-91.
- [11]范如国.平台技术赋能、公共博弈与复杂适应性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21(12):131-152+202.
- [12]范鑫.数字经济发展、国际贸易效率与贸易不确定性[J].财贸经济,2020,41(08):145-160.
- [13]高帆,李童.中国城乡资本流动存在“卢卡斯之谜”吗[J].经济学家,2016(03):75-86.
- [14]龚六堂.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若干政策建议[J].国家治理,2020(46):33-38.
- [15]龚明远,周京奎,张朕.要素禀赋、配置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J].农业技术经济,2019(06):57-69.
- [16]郭家堂,骆品亮.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吗?[J].管理世界,2016(10):34-49.
- [17]郭庆旺,吕冰洋.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46-62+207.
- [18]李宏兵,王爽,赵春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来自“淘宝村”的经验证据[J].经济经纬,2021,38(01):37-47.
- [19]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C]//.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总第6期).[出版者不详],2003:106-134.
- [20]刘欢.工业智能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来自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视角的解释[J].中国农村经济,2020(05):55-75.
- [21]刘晓光,张勋,方文全.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J].世界经济,2015,38(03):145-170.
- [22]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06):50-58.
- [23]欧阳日辉.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数商兴农”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新方向[J].科技与金融,2022(04):49-53.
- [24]彭超,段晋苑,左臣明,等.“数商兴农”:从阿里平台看农产品电商高质量发展[R].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阿里研究院,2022.
- [25]钱忠好,牟燕.土地市场化是否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基于中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的检验[J].管理世界,2013(02):78-89+187-188.
- [26]邱泽奇,张樹沁,刘世定,许英康.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6(10):93-115+203-204.

- [27]沈坤荣,张璟.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07(01):30-40+171-172.
- [28]沈丽珍,顾朝林,甄锋.流动空间结构模式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0(05):26-32.
- [29]孙宁华,堵溢,洪永淼.劳动力市场扭曲、效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J].管理世界,2009(09):44-52+187.
- [30]田野,叶依婷,黄进,刘勤.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中介效应[J].农业经济问题,2022(10):84-96.
- [31]王奇,牛耕,赵国昌.电子商务发展与乡村振兴:中国经验[J].世界经济,2021,44(12):55-75.
- [32]王颂吉,白永秀.城乡要素错配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理论与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07):31-43.
- [33]王向阳,谭静,申学锋.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理论框架与政策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20(10):61-67.
- [34]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2005(10):24-36.
- [35]吴婵丹.中国互联网、市场潜能与产业布局[D].华中科技大学,2015.
- [36]张磊,韩雷.电商经济发展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38(05):3-13.
- [37]张旺,白永秀.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的理论构建、实证分析及优化路径[J].中国软科学,2022(01):132-146.
- [38]赵儒煜,邵昱晔.要素流动与区际经济增长[J].求索,2011(02):69-71.
- [39]Arthur, W, B.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New World of Busines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6.
- [40]Brandth B., Haugen M. S.. Farm diversification into tourism e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ident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1(27):35-44.
- [41]Carmen L., Shan L. P., Sue N., Lili C.. The Emergence of Self-Organizing E-Commerce Ecosystems in Remote Villages of China: A Tale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Rural Development[J]. MIS Quarterly,2016(40):475-484.
- [42]Castells, M. The space of flows. In: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2010.
- [43]Chen, K., Long, H., Liao, L., et al..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hina's Evidence[J]. Land Use Policy, 2020, 92: 104465.
- [44]Gao Y., Zang L., Sun J.. Does Computer Penetration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China[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2018,42(05):345-360.
- [45]Kauffman, R.J., Kumar, A. Impac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n Country Development: Accounting for Area Interrelationship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2008,13(1):11-58.
- [46]Li X., Guo H., Jin S., Ma W., Zeng Y.. Do farmers gain internet dividends from E-commerce ado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Food Policy,2021(101).
- [47]Long, H., Tu, S., Ge, D., et al.. Th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ritical Resources in Rural China Under Restructur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392-412.
- [48]Murdoch, J. Networks — 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0,16(4):407-419.
- [49]Ploeg Jan.. The Peasantri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ommoditisation Debate Revisited[J].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10(37):1-30.
- [50]Röller, L, H., Waverman, L.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imultaneous Approach[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4): 909-923.

[51]Salemink K., Strijker D., Bosworth G..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unequal ICT availability, adoption, and use in rural area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7(54): 360-371.

[52]Sicular, T., Ximing, Y., Gustafsson, B. and Shi, L..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Inequality in China[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7, 53: 93-126.

[53]Tang W., Zhu J.. Informality and rural industry: Rethinking the impacts of E-Commerce on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75): 20-29.

[54]Yuan, Y., Wang, M. S., Zhu, Y., et al.. Urbanization's Effect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A Meta-Regression Analysis[J]. Land Use Policy, 2020, 99: 104995.

[55]Zhang, Y., Long, H., Ma, L., et al. Analysis of rur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driven by e-commerce based on the space of flows: The case of Xiaying village in central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3: 196-209.